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

历史主义的兴起

Friedrich Meinecke

[德国]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 著 陆月宏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历史主义的兴起

[德国]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 著 陆月宏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主义的兴起 / (德) 梅尼克著; 陆月宏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10

(人文与社会译丛 / 刘东主编)

ISBN 978-7-5447-1466-2

I. ①历… II. ①梅… ②陆… III. ①历史主义—研究
IV. ①K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1494 号

- 书 名 历史主义的兴起
作 者 [德国]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
译 者 陆月宏
责任编辑 王 蕾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21.5
字 数 518 千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466-2
定 价 4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德文版导言

关于最后的著作《历史主义的兴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曾坦承道，他在这其中探讨的是几十年来所关注的问题。这不仅是出于他的职业能力，而且“是在一种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的主导性生命原理的意义上”^①。历史主义这种现代历史观不仅是一种科学原理及其应用，更是一种生命原则，一种“对人类生命的全新审视，由此之中才能产生科学原理”^②。因为“历史的科学只是运用一种早就在现代人的内在生命中作为原理和指南、认知工具和观念产生作用的东西，从而持续产生了一种影响，这种影响远远超出了纯粹专业性的科学领域”^③。因此，历史主义发展的问题包含了一场极其普遍性的知识和精神上的革命，涉及到往昔相当陌生的思想方式和感受方式的发展。对于历史意识和现代的科学历史的发展而言，这些是一种前奏，形成了必不可少的历史基础——对于其他的发展同样是一种基础。这种用新颖明确的生命原理突破迄今为止被作为一种绝对真理的人类思想和感受的古旧且相反的层面的历史事实，用梅尼克自己的话来说，在他面前再次呈现出了一个

① 《论历史主义的兴起史与施莱尔马赫的个体观念》，见《论历史意义与历史的意义》，第2版，1939年，第95页。

② 同上，第96页。

③ 同上，第95页。

“最高意义上的生命问题”。换言之，他早年的及其终其一生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与他个人和他所处时代的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这就产生了关于《历史主义的兴起》传记性的基础这个深入的问题；当我们考虑到梅尼克自己曾反复地指出过，他关于思想史的三部伟大著作——《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近代史中国家理性的观念》和《历史主义的兴起》——产生于一个共同的源泉时，这个问题看起来就变得更加宽广了。在1932年研究《历史主义》期间，梅尼克庆祝了70岁的生日，朋友们为他献上了汉斯·托马斯的一幅原画，描绘了“靠近塞京根平稳柔和地流淌着的上莱茵河，在这里，它在拥有茂密树林的河谷之间穿越了宽阔的草地”。在致谢词^①中，梅尼克说道：“正是在上莱茵河地区，我初次遇到了所有那些历史问题，那些我随后的整个生命的工作都将献身于此的历史问题。我不知道，对其中那些最接近我心灵而成长起来的、然而又是最困难的问题，我是否终有一天不得不在残缺的答案前止步。”在关于斯特拉斯堡岁月（1901—1906年）的回忆录的第二卷中，他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我在1907年和1936年之间的三十年中得以出版的三部研究思想史的著作，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在这个地方萦绕于我心头的观念。它们一部分是已然牢固地扎根于我心灵中的主导性思想，一部分表示了一种朝向崭新的和迷人的历史世界现象的兴趣的转移，而对于这个历史世界，我迄今为止都是一个陌生者。”^②正是在斯特拉斯堡，他构思了《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第一卷。它包含了一个命

① 《付梓通函》，柏林—达勒姆，1932年11月底。

② 《斯特拉斯堡、弗赖堡、柏林1901—1919年回忆》，1949年，第40页。类似的见于《历史主义的兴起》，参看下文第9页：“这三本书中共同具有的一事物都得回溯到我在一个世代之前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所度过的快乐岁月中的早期观念。我把这本书献给这些日子，以志纪念；我向一些在那个时期生活过的幸存者们的致意，他们知道在上莱茵文化圈中有着怎样丰富的知识才能。”

题——我们将会回到这个命题——梅尼克后来在这中间洞悉到了《历史主义的兴起》的萌芽^①。在愉快的1905年,在他复活节访问佛罗伦萨时,他被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抓住了,“在一个充满了曼妙美丽事物的世界中被沉重的权力政治问题吸引住了”。也正是这次旅行,为他后来的《国家理性观念》形成了一个出发点^②。同样在1905年,《德国崛起的时代》与《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中业已萌生的问题联系在了一起^③;正是在这一年,他似乎向着在《历史主义的兴起》中所研究的伟大问题迈出了最初的直接步伐。在他的研究班上,他安排了一次小型的席勒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在其中,他把席勒在耶拿大学所作的关于普遍历史本质的就职演说作为主题。“席勒的精神与我们既近又远。他用以看待世界历史的进步的和启蒙的乐观主义,不能与我们的历史现实主义同等看待——自那时以来,我在心里一直反复思考着在我们今天的历史观中那些将我们和他分离的东西,与那些将我们和他联系在一起的东西。”^④

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在《历史主义的兴起》背后,在梅尼克的思想中有一个“最高意义上的生命问题”;而且也清楚的是,就像他早先的两部观念史著作一样,《历史主义的兴起》也起源于同样的知识根源;在这所有三部著作中的主题都是,崭新的、具体的和个体化的思想方式与陈旧的、抽象的和绝对的方法之间的冲突——因此现在产生的是一个一般而言支配性的梅尼克—生命问题,而这三部伟大的著作就是分别地同时又内在联系地描述这个问题的。但是,这个问题仍然只有通过梅

① 《斯特拉斯堡、弗赖堡、柏林》,第191页。

② 同上,第43页。

③ 参看《德国崛起的时代》,见于《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第3版,1915年,第20页,注释1。

④ 《斯特拉斯堡、弗赖堡、柏林》,第46页及下页。

尼克内在思想变化的追询,以历史思想的方式来予以回答。我们在此注意到,这些历史主义著作的基本问题的源泉,得远远地回溯到他的自传性叙述中,而不仅仅是上莱茵岁月中。

梅尼克曾经说起过,终其一生,在他与北德意志—普鲁士家乡世界的内在联系中有一个持续进行着的松动过程^①。在父母和家乡世界中的互有差异却又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因素中——正统的虔敬主义、忠于王权的保守主义、基督教—社会服务信念——在他心中最先陷落的是宗教支柱。梅尼克讲述了艰难的世界观斗争,他不得不在大约 1878 年行坚信礼的时候进行这场斗争。后来在与关切儿子的灵魂得救的父亲之间进行的这场斗争中,他父亲想尽一切办法向他灌输使自己获得灵感和幸福的正统虔敬主义^②。正如通常所发生的,这种过分的宗教压力在这里也走向了其孜孜以求的结果的反面:与父母家乡的宗教联系永远地断裂了^③,而普鲁士—保守主义—君主制的精神基础和为基督教—社会服务激发起来的社会责任感却长期或持久地经受住了考验。

但是,这个脱离了宗教—正统世界观的年轻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思想世界中又看到了什么呢?自从这个世纪中叶以来,思想舞台的前沿部分就受到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的或者泛神论的自然科学的支配,这种自然科学“把宇宙看作束缚于机械因果法则的铁制锁链中”^④。年轻的梅尼克首先在诗歌领域遇到了这种时髦的自然科学精神,在威廉·延森(Wilhelm Jensen)和威廉·约尔丹(Wilhelm Jordan)的诗歌中遇到了这种精神。他们两位都是彻头彻尾的思想模仿者,更为特别的是约尔丹,他呼吁用现代的“具有科学知识的诗歌”来取

① 《经历,1862—1901 年》,第 95 页。

② 同上,第 74 页。

③ 同上,第 80 页。

④ 同上,第 75 页。

代神话时代的诗歌:由此产生的是一种教育诗,将唯物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与民族的尼伯龙根浪漫主义结合起来,以形成一种反基督教的“德意志信仰”。这些思想人物对于青年梅尼克来说,宛如精神催化剂那样地起着作用,“犹如一颗火星掉进了火药中”^①,他们在他的基督教—宗教精神未能成功生长的地方唤醒了哲学意识^②。他从中吸取了一种“极为模糊不清的和青涩的泛神论”^③,不过他却没有从中推理出,就像真正的诗人凯勒(G. Keller)和施托姆(Th. Storm)也曾要求的那样,人类精神顶礼膜拜于取神而代之以的自然法则的王位。青年梅尼克虽然丧失了对《圣经》中所记载的施行奇迹并且干预自然和历史进程的人格化上帝的信仰,但他依然信仰一种在“理念世界”中自我彰显出来的神圣的世界背景^④。从这种辩证的开端出发,他经由普雷格(Preger)的《中世纪德国神秘主义史》走向了“表现出相互联系的内容”^⑤的历史现象,走向了中世纪的泛神论派别,并由此走向了诺斯替教派学说,质询了它们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之间的联系^⑥。事物的两面性显然也被他深刻地体验到了:一面是自然科学所教导的自然或物质的坚固的因果联系,另一面是在永恒的源泉中被体验为神圣之物的火花,它和世界都来自于同一个神圣源泉,而理念世界也是源出于此的;不过自然和理念、自然和精神还是通过一种隐隐约约的泛神论结合在了一起。梅尼克在离开学校时是一个自由思想者,不过他“渴望在理念上解释世界”,同时执着于并自豪于他的具有严格自我负责精神的良知权利,这种自我负责精神

① 《经历,1862—1901年》,第75页。

② 同上,第76页。

③ 同上,第75页。

④ 同上,第76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第76页及下页。

乃是新教的遗产,是他的父亲出于拳拳爱心而不顾他成长时的反抗压力而传递给他的^①。

德罗伊森(Droysen)关于“历史方法与历史百科全书”的讲座使得年轻的大学生梅尼克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在这个讲座中,这位声名远扬的教师两次对这个学生产生了“风驰电掣般的”唤醒作用,唤醒了迄今为止在他身上已然占据支配地位却尚未清晰形成的思想^②。第一次发生在德罗伊森的如下论述中:“倘若人们把某个人所是、所有和所产生的一切东西称之为A,那么这个A就是由 $a+x$ 组成的,其中a包括了一切来自外部环境诸如国家、民族、时代等等的东西,而剩下的微量的x则是他独特的作为,是他自由意志的作品。无论这个x始终显得那么的微小以至趋向于消失,但它却拥有无限的价值,从道德和人类的角度来看是仅有的价值。拉斐尔使用的颜料、画笔和画布来自于他无法创造的材料;而运用材料的方法则是他从这样那样的大师那里学来的,他关于圣母、圣徒和天使的观念是在教会传统中得到的;而这样那样的修道院以一定的酬金向他订购绘画作品。但是,西斯廷教堂壁画就是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材料和工艺条件,在这样的传统和艺术直觉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公式 $A=a+x$ 中的微小而几不可辨的x为此奇迹作出了贡献。”^③“就是它,”梅尼克在回顾往事中曾这样写道,它曾经使他衷心喜悦,“人格的秘密是一切历史行动和作为的基础。”^④这是作为梅尼克思想中的历史思想之关键概念的个体观念的最初闪耀,这种个体观念将会远远地超越德罗伊森更多从道德角度加以理解的个体观

① 《经历,1862—1901年》,第81页。

② 同上,第86页及下页。

③ 德罗伊森,《历史学:关于历史百科全书和历史方法的演讲》,许布纳(R. Hübner)出版,第2版,1943年,第397页及下页。

④ 《经历,1862—1901年》,第87页。

念。在青年梅尼克心中点燃火焰的德罗伊森讲座中的另一个地方,则是他的结论:“……我们不像拥有实验手段的自然科学,我们只能探索,除了探索还是探索。因此:最彻底的探索也只能获得关于过去的片断现象,历史和我们关于历史的知识之间的区别极大……它本将使我们沮丧气馁,但是,我们毕竟可以凭着片断零碎的材料来追寻历史中思想的发展……我们由此获得的不是一幅如其所是的历史画卷,而是我们对它的理解和思想上的重构。”^①德罗伊森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种道德化个体的意志行为之间的联系,但认为它只有通过有意识地采纳了一定立场的历史学家的道德决定,才能产生出来:不过青年梅尼克在对德罗伊森的这些话语的创造性误读中,聆听到了认识观念史和思想史的重要性,以至于他在晚年还把这种思想史倾向称之为与生俱来的“原罪”^②。最终,思想史被作为问题史加以理解——这是德罗伊森赠予青年梅尼克的一种继续对他的科学研究产生作用的思想驱动力:“强烈地渴望为这个压迫人和折磨人的问题寻求答案”^③。就像德罗伊森阐释的,这个真正的历史问题,“包含的内容比我所学到的更多,它是一种预感,是我迄今为止内在体验过和经验过的事物整体中喷薄而出的。这就是我能够并确实地这样发问的原因”。德罗伊森在这里为梅尼克指出了历史学家的个体问题和时代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个问题压迫着他,要求他以历史方式来加以研究。因此可以理解的是,这份德罗伊森向听众分发的小小的历史学纲要,对于青年梅尼克却成为了一个“思想百宝箱”,在“钟爱的默里克(Mörke)诗歌”之旁陪伴着他^④。

① 德罗伊森,见前引书,第316页。这段见于许布纳版本的《历史学》的表述来自梅尼克的大学听课笔记本。

② 《经历,1862—1901年》,第77页。

③ 同上,第88页。

④ 同上,第91页。

按照梅尼克的说法,在德罗伊森讲座中,伟大时代的德国唯心主义为科学事业投下了最后一抹温暖明亮的光辉。而且,由于支配性的实证主义,当时的科学事业有蜕变为“苍白暗淡的”事业的危险^①。时代的这种实证主义特征,“力图为精神科学提供一种尽可能精确的和经验性保障的特点”,对梅尼克的研究道路也产生了作用^②,”这种创造精神的理念,在历史和生命中个体化为千万种奇迹,在当时对我产生作用的大量影响中还依稀可辨,不过它并没有生气勃勃地渗透进我所接受的整体学说中去。德高望重的德罗伊森在我身上点燃的微弱火星,虽然在我宁静淡泊的岁月中继续燃烧着,不过却被学术研究的要求所模糊。”^③能够最出色地继续滋养这团火焰,并引导思想道路从康德研究向着后康德形而上学研究推进的狄尔泰,却被搁置一旁,因为他“当时被普遍地当作晦涩难懂和难以理解的人物”^④。

在此,需要另一次短暂的危机,以便成功地进一步澄清唯心主义的基本立场。这次危机发生在梅尼克在波美拉尼亚的厄尔岑大庄园中做家庭老师的时期,他在这里目睹了“迄今为止受到严厉拒绝的从父母那里接受的基督教”,再次成为了“一种奇妙的走向神圣的生命力量”,以至于一夜之间就唤醒了思想,使他有可能将研究转向神学^⑤。但是一两天后,这种心血来潮的转变就被克服了:梅尼克的“自由唯心主义”从这种与教条基督教的最后争辩中凯旋而归,并且同时澄清了思想,采取了一种新颖的立场:他抛弃了“最初的泛神论外壳”,因为他“用一个简单的回答搁置了世界中的神圣原则是怎样的问题,即存在这样一种事物,

① 《经历,1862—1901年》,第87页。

② 同上,第119页。

③ 同上,第119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129页。

它自身与世界的联系难以察觉,它自身不是神圣的,而仅仅是与神圣有所联系”^①。梅尼克思想的一个基本问题就在这里出现了:自发产生的、道德的和创造性的自由精神与具有生物的和机械的因果关系的世界结构的彼此交织、共生共长的关系。它是一个超越整体的二重性现象的问题,是在创造文化的历史个体中 a 与 x 之间更为详细的关系的问题。在 1925 年,思想业已成熟的梅尼克关于这个问题还写下了如下的话:“文化与自然,我们也可以说上帝与自然,当然是一个统一体,不过却是一个自身中带有分裂的统一体。上帝带着叹息和呻吟、承受着罪性,而从自然中绽露出来,因而每时每刻都陷于坠落回自然的危险之中。对于毫无顾忌的和诚实的观察者来说,这是最后的话——不过它毕竟还不是纯然的盖棺论定之语。惟有信仰,一种在内容上变得越来越普遍并与持存的怀疑倾向进行着搏斗的信仰,才能提供慰藉,为对于我们来说殊难解决的生命问题和文化问题奉献一种超验论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已不再相信,有某种哲学提供了或者还能够提供这种超验论解决方案。”^②

不过,纯粹历史自身尚未成为青年梅尼克解决这个问题的领域。这个问题始终在他的个人世界和过去的世界中追问着永恒的东西。梅尼克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是一个勃兰登堡—普鲁士历史的专家,持有显而易见的普鲁士主义立场,虽然他已经倾向于把学术研究的重点从为德罗伊森和科泽(Koser)阐释过的君主制时代——他在相当物质化的行动中没有看到单个政治人物的精神在心理学上进行深刻解释的可能性^③——转向解放时期、基督教—德意志文化圈和威廉四世。这些,

① 《经历,1862—1901 年》,第 119 页。

② 《历史中的因果性和价值》(1925 年),见《创造之镜:德国的历史著述和历史解释研究》,1948 年,第 82 页。

③ 《经历,1862—1901 年》,第 69 页。

在梅尼克的家乡世界依然是一种余韵悠长的精神力量。青年梅尼克试图在当时思想中的时代问题上澄清自己的立场。它涉及到正在进行中的发生在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解释之间的争辩,用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的话来说就是:“在这里争论最激烈的是,个人的生命价值内容受惠于自身或者受惠于对整体压倒性的依赖最终到了何种程度。正如文艺复兴时期一样,普遍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再次发生了激烈的冲突。”^①这种矛盾对立在这个问题中达到了顶峰,“精神生命”(Seelenleben)在何种意义上和在何种限度内能够服从于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因为在这里,首先要决定的是这些思想方式在哲学上的唯一有效性方面的权利。这是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想家的努力方向,“按照自然科学的观点来思考人类的社会生活、历史发展和精神存在之间的普遍关系”。这个梅尼克1887年的国家考试论文的论题^②,似乎是狄尔泰提出来的,不过却是梅尼克自己所要求的,其表述如下:“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在方法上的比较。”自从德罗伊森的讲座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浮现在青年梅尼克眼前^③。他通过阐述关于自然科学方法对于研究精神生命是否有效的方式引进了这个问题,认为它产生于“时代的运动”,不过他的评论却表明,对于他而言,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却存在着一个生命问题,“最深刻的人类生命问题……为表面无关痛痒的和毫不引人怀疑的争论”所提及。梅尼克洞察到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意志自由,因为倘若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严格的因果法则也在历史领域中天

①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此处引用的是第9版和第10版,1921年,第528页。

② 柏林总档案馆的梅尼克文献。《福斯报》上的修订过的简缩版,1887年,周日增刊第48和49期,至11月27日和12月4日的第555期和第567期。凯塞尔(E. Kessel)将在这个版本的包含了梅尼克历史哲学论文的第五卷中出版这部作品,这部作品将首次考虑到报纸中的内容。

③ 《经历,1862—1901年》,第132页。

衣无缝地支配着,那么自发产生的事件就必须被清除出去。即使人们承认道德和历史世界至少部分地服从于因果法则,但是困难还是会以这样的问题展现出来,“在影响了我们行动的总体条件之旁,是否还存在着一个微小的、甚至是极少量的个人的和真正自发产生的行动 x 引导着我们的行动”。梅尼克在这里求助于德罗伊森,引用了他的西斯廷圣母像的例子,指出 x “具有无限的力量”,包括了人类整个的道德价值、人类整体的和独特的价值。在梅尼克看来,肯定这样一种自然产生的 x 存在的基础,正在于道德意识的行为。“一种谜样的感受。环绕在我们的观察精神立场周围的是因果结构,只有在崇高的自我意识这里,在栖居着一切感知和思想的自我意识这里,才能驳斥决定着下面的一切事物的法则……这种直接感受的要求并不屈从于理性的统辖之下。这里不是诉讼一方面对法官的关系,而是彼此对立的两方,每一方都像另一方那样热烈地宣称着生命权利……它们是同母的不同儿子,双方都扎根于人类内在的精神生命中——情感和道德意识对峙着而毫不退让地贯彻理性一往无前的因果法则……”这些话极其重要,不仅因为它们梅尼克历史理论中最初表达出来的一部分,以一以贯之的方式直接通向他 1925 年总结性的论文《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与价值》和 1933 年的《历史与当代》;而且因为它们直接通向了梅尼克最重要的生命问题和思想问题。人类内在的精神生命是两个不同的、彼此敌对却又具有同样权利的儿子们的共同母亲:一方是理性,另一方则是直接的情感和道德意识。一方声称普遍的法则性,另一方则要求自由、自发性和个体性。这种在人性中被极为强烈地感受到和得到强调的二重性,在遵循法则的智性力量与个体一直觉的精神力量之间的二重性,或许也得追溯到梅尼克的人格气质,这种人格气质既为理性主义遗产又为他生命中具有的浪漫主义—后浪漫主义倾向塑造而成^①。因此,梅尼克早期的个体

① 《经历,1862—1901 年》,第 12,44,77 页。

观念由于德罗伊森和康德的影响而具有浓郁的道德意味,但我们必须探究他的个体观念逐渐发生的变化、深化和拓展。但是对于梅尼克来说,核心问题是普遍法则和个体自发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最初在这里表现为意志自由问题,自由和必然的问题,以一种为时代决定的科学史上的方法争论的外观出现。这个问题可以找到形形色色的表达形式,而在梅尼克的思想中,它最普遍的表达形式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矛盾。

在撰写最早的历史理论论文时,梅尼克读到了狄尔泰在 1883 年问世的《精神科学导论》第一卷,由此,他一劳永逸地赢得了进入伟大的文化哲学和精神哲学的通道。人们在《精神科学导论》读到像下面这样对梅尼克来说成为基本命题的话^①时,就会理解,德罗伊森和狄尔泰同时为梅尼克最初的理论作品提供了思想灵感^②:“由于习以为常的观念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也就是说精神科学)是与自然科学判然有别的,所以这种动机就引起了对于人类自我意识的深化和总体化。人们在尚未被审察思想起源的行为触及时,就在自我意识中发现了意志的自主性和行动的责任感,发现了一种把一切归属于思想并在人格内部建立自由堡垒对抗一切、借此将自身与整个自然隔离开来的能力。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说就是,他在自然中发现了国中之国(imperium in imperio)。对于他来说,唯一坚实存在的事实是意识,这种在他之中独立运转的精神世界构成了生命中所有的价值和目的,他的每个行动的目标都在于创造精神事实。因此,他从自然王国中分离出了一个历史王国,在这里,在建构了自然的客观必然性织体的中间,自由在整体的无数个点上播撒开来。正是在这里,意志行动与一开始就已然包含了在其过程中发展着的一切自然变化的机械过程产生了矛盾。意志能够产生力

① 《经历,1862—1901 年》,第 132 页。

② 《精神科学导论》,第 6 页。

量和作出牺牲,这是个体甚至在当下经验中都大为叹赏的。这些意志行动确实产生了结果,促成了个人和人类中的发展。它们远远超越了人类意识中自然序列的空洞和单调的重复出现,而后者看来正是那些狂热崇拜知识发展的人所推崇的历史进步的理想。”但是,梅尼克在狄尔泰那里发现了两种对于他的思想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的基本观点:一是把德罗伊森进行了主要为道德化解释的个体观念,拓展为一个更加宽泛的精神—物质整体的个体观念,它代表了一个无限的世界,“最终在自身中包含了无限的自然领域”^①,建构了一种生物学的、机械的和精神的三位一体的因果关系^②。也许就是在这里,梅尼克初次遇到了狄尔泰的格言“个体是无限的”^③。狄尔泰在这里谈到了“每一个这样的单独个体的独特性质,这样的个体在深不可测的精神宇宙中到处活跃着”^④。这种对个体观念的强化和深化,是狄尔泰传递给青年梅尼克的一个基本观点,而另一个基本观点的重要性也并不逊色于它。这就是精神科学的“自然体系”观念,在狄尔泰的这部著作中第一次出现。狄尔泰在此显示了,中世纪对于历史进程与国家学说和社会学说的形而上学解释,在近代是如何被奠基于自然法观念的“自然体系”所取代的。这种变化发生在人们已然意识到老形而上学和新自然科学及其方法之间的矛盾之后^⑤。正如狄尔泰在那时所解释的,“自然体系”尚未意识到新斯多亚主义的影响,而仅仅通过把自然科学的机械式因果观念应用到人类个体、心理学、社会和国家中而产生。“这种方法,”狄尔泰说道,“‘自然体系’用以研究宗教、法律、道德和国家的这种方法是不完善的。

① 《精神科学导论》,第29页。

② 同上,尤其是第14,17,19页。

③ 同上,第29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373页及下页。

它为数学方法所支配,这种数学方法在机械的自然解释中曾产生过卓越非凡的成果……这些方法的基础是一种抽象的人性方案,致力于根据少量的和普遍性的心理成分来解释人类历史生命的事实……”^①在这个狄尔泰引介给他的支配着思想史的“自然体系”观念中,梅尼克在自然科学—机械式的因果关系观念之旁遇到了思想科学史上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方案。它与他业已采纳的个体化思想方案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这就是自然法观念,狄尔泰为此曾如是说道:“老式自然法学派的基本错误在于,用孤立化个体、然后机械式地将个体联系起来的方法来建构社会。”^②在精神科学自身中的自然法思想和个体化思想的矛盾中,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因果性和自发性、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矛盾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

我们现在在这里必须将目光投入到这种矛盾的另一种变形。我们再次回忆文德尔班的话,即自然科学的和历史的世界观之间的斗争在下述地方极其激烈地爆发了出来,“亦即在哪个地方可以最终决定,个人的生命价值内容受惠于自身或者受惠于对整体压倒性的依赖最终到了何种程度。正如文艺复兴时期一样,普遍主义和个人主义再次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种关于个体是支配着还是服从于普遍法则的问题,也是强烈地令梅尼克魂牵梦绕的关于个体力量与超个体法则之间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迄今为止,梅尼克是作为形而上学家、历史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卷入其中的,而现在它成为了一个涉及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问题。因为梅尼克不满足于成为一个纯粹的专业学者,而希望成为一个丰富的、充满了各方面人性意义的个体。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独特的个体发展的联系中对国家的研究也属于这样的一种个体全面发展的方案。它是“所有生命价值彼此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精神……

① 《精神科学导论》,第379页,强调为狄尔泰所加。

② 同上,第31页。